

# 白银锡勒牧场上的人—草—畜

赛 汉<sup>1</sup>, 张海洋<sup>2</sup>

(1. 北京语言大学 继续教育与网络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3; 2. 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近年来, 内蒙古地区频发的沙尘暴和草场沙化引起了举国关注。国家和地方政府为此斥巨资治理, 同时国内的游牧文化研究也出现了生态学上的转向。学界目前认识到: 草原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人(观念和制度)—草场—牲畜是草原生计不可分割且需要相互平衡的三要素。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变动, 都会对系统整体产生影响, 因此对草原生态的治理也应该贯彻整体论。今日内蒙古草原生态的变化只是问题的表征, 它显示出草原生态的三要素构成的稳定框架或共存关系正在被打破。

**关键词:**人口流动; 草场管理; 畜种改良; 发展

**【中图分类号】** C95-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 (2011) 03-0035-05

白银锡勒牧场位于锡林郭勒草原中部、锡林浩特市东南55公里处。全场总面积3730平方公里, 其中草原占总80%以上。

白银锡勒牧场的人口构成及流动非常典型。建场之初, 前来开发这片“无主之地”的职工仅有20人。后来的知青和兵团战士曾使牧场人口高达1.1万, 他们来自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 是当时的内蒙古之最, 人口构成的复杂程度全国罕有。2000年后该牧场开始实施锡林郭勒盟制定的“两转双赢”政策, 人口向外转移。而中小学合并, 牧民子女进城上学, 父母进城陪读等, 也推动了人口向中心城镇转移。白银锡勒牧场过去40年人口大规模流动显然是移民研究难得的素材。

白银锡勒牧场经营在建场之初实行过(新)苏鲁克放牧制、集体化, 军垦时期大力发展过农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草畜双承包制, 后来实行了草场使用权与所有权分离的“双权一制”, 并推行以户单位围栏草原。牧场数据显示: 当地草原生态恶化不是出现在牧场人口和牲畜头数最多的时期, 而是出现在围栏化之后。这一事实使得学界政界普遍认为的生态恶化缘于“超载放牧”的说法略显牵强。倘若人口压力不是草原生态恶化的主因, 那么生态移民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草原困境值得商榷。

## 一、移民与发展——白银锡勒牧场的人口流动与发展

### (一) 白银锡勒牧场的发展及人口的迁入

据《锡盟畜牧志》介绍, 种畜场1950年10月成立。1969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成立, 种畜场改称5师31团; 1975年10月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改制, 取消兵团建制番号, 31团改称白银锡勒牧场; 1984年10月, 根据内蒙古党委办公厅通知, 锡盟所有牧场改为苏木或生产队; 1978年后,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鼓励下全国农区实行以户为单位的承包责任制, 白银锡勒牧场也积极落实国家政策, 实行了草畜双承包。

牧场的经济生产和体制沿革也带来了当地人口的大幅迁入, 导致农业播种面积扩大, 通过阅读相关文献, 结合社会历史背景解读阶段性人口变动的原因为:

1. 1957~1965年: 人口流入的第一个高峰。牧场人口从829人增加到6992人。除从各地调入和有计划的移民外, 多为内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流民。1959~1960年, 牧场接收了全国各地(主要为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流入人员约1300余人。这些人带来了不同的生产习惯和文化传统。由于人口激增, 造成粮食压力增大, 大面积草原被开垦成农田。

2. 1965~1975年: 内蒙古发展生产建设兵团

**【收稿日期】** 2011-01-23

**【作者简介】** 1. 赛汉(1971-), 女(蒙古族), 北京语言大学继续教育与网络教育学院讲师, 法学博士。

2. 张海洋(1955-), 男,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法学博士。

发展时期是牧场人口增长的第二个高峰。1967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师31团成立并接管白银锡勒牧场后,仅1968—1972年就接收了来自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以及其它省市的总计1960名知青。

3. 牧场人口的最高峰为1982年,达到12959人,随后开始下降。下降原因包括知青返回原籍(现在留在牧场的只有一对知青夫妻),以及部分人口调出等。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知青大量返城并没有使牧场人口骤降,说明当时牧场或有大量未统计的流入人口。

如此巨大的人口变动对农牧业结构及生态环境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牧业:压力增大。建场之初的小规模农业是基于“农业的经营为牧业服务,即为牲畜提供必要的饲料”。随着人口增加,白银锡勒牧场不得不以解决吃饭问题为中心,不仅没有达到农牧结合的目的,还引发了农牧矛盾如争地等问题的产生。

2. 农业:1953年牧场农业开垦面积为85.5亩。1957年播种面积达到20970亩。四年间人口增长40倍(从20人增加到825人),播种面积更增长246倍。到1980年前,牧场耕地达21.3万亩,播种面积最多时达12万多亩。1980年以后退耕还牧。1990年耕地减为164800亩,播种面积减为91740亩,但亩产波动极大,常年维持在50公斤以下。在干旱草原不适合农耕的气候条件下,这种粗放的低效率的农业开垦造成牧场生态恶化,沙化加剧,从而制约了牧业的发展。

3. 景观:居住格局就是一例。今天外人走进白银锡勒牧场,首先看到的是连片的定居房屋。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汉族移民增多,草原牧区套用农区的做法,在水源地附近建起大批定居点。<sup>[1]</sup>

白银锡勒牧场的人口迁人在内蒙古的现代移民史上具有代表性。根据美国学者史华慈研究,在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0年里,人口密集地区的大批农民流动到人口较少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西北和内蒙古地区。<sup>[2]</sup>这些移民不论是出于政府组织型移民<sup>[3]</sup>还是周边省区农民(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自发移民,都对白银锡勒牧场生态造成了巨大冲击。人口增加、牲畜增加,加之不同时期的政府相关政策的失误,致使草场耕地的生产力下降、草地退化、水资源短缺、沙化严重、草地再生能力减弱、草场生态失衡。目前退化草场已达

20%以上。据草原生态定位站对1980年到1990年10年间的草地生产力的监测,草地产草量已由先前的200—300斤/亩,减到目前100—125斤,降低约40%。

## (二) 人口的迁出

白银锡勒牧场人口经历两次外流:一是1982年后的知青返城(这一数目很快被非计划流入人口补充);二是2000年后,生态环境恶化,政府开始采取治理措施,着力治理华北沙漠地区以及内蒙古草原。内蒙古自治区2000年开始实行的生态移民工程几乎覆盖自治区所有盟、市。位于锡林郭勒草原中部的白银锡勒牧场,也因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导致了部分职工生态移民。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自2001年开始实行“围封转移”;随后又实行了“两转双赢”政策,其实质内容为:转变生产方式、转移牧区人口、保护草原生态、增加牧民收入。2006年11月27日新华网报道了锡林郭勒盟实行两转双赢的情况:<sup>[4]</sup>“三十多年来掠夺性的经营,埋下了生态灾难的祸根…锡盟提出“两转双赢”,转移农村牧区人口…从生态角度看,只有牧区人口减下来,牲畜数量才可能进一步降下来。锡盟一位有心的领导算了一笔经济帐:锡盟地广人稀,近20万平方公里草原分布着20万出头的牧民,每转移出一个牧民,就相当于有效缓解1平方公里草原的生态压力。转移牧民,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在参照国内关于生态移民的研究成果以及国外对于近年来发展问题的反思后,对于“两转双赢”有以下几点分析:

首先,“两转双赢”属于保护生态和发展经济并重的混合型移民。一位当地负责移民的地方官员在回答“牧民是否愿意移民”时说:“移民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牧民富起来。现在他们(舍饲)养牛、种庄稼,这些才能让他们致富的。”<sup>[5]</sup>

其次,关于移民后的土地利用方式的思考。移民前,大多数牧民认为移民后可以自主决定土地使用方式,而笔者在对位于呼和浩特市郊区的移民村—新优佳养殖场的调查中发现土地利用方式在移民和基层官员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移民多数认为自己是牧民,习惯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畜牧业);而地方官员尽管也认为文化很重要,但更倾向于认为土地的利用方法应该以经济为导向,文化和民族不是决定性因素,他们说“那些牧民不想离开(他们的家乡),他们还想做牧民。但是现在

谋生要比延续老一代的生计方式更重要。”<sup>[5]</sup>

第三, 移民后生计方式的变化以及劳动力市场化。草原和蒙古族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通过上文中对移民后丧失对土地利用方式的自主权的分析, 可以推断出“两转双赢”中的部分移民行为是为了发展经济进行的。而一些牧民在被移民后因为种种原因, 无法继续从事畜牧业, 成为城市里没有“现代”技术而只能出卖体力的劳动力, 这样无形中就扩大了劳动力市场, 生态移民也因此将矛盾地——草原转换成了一个土地资源稀缺但劳动力丰富的区域, 这点与农区没有什么区别。其结果是传统畜牧业被排挤, 而畜牧业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也随之逐渐消失, 据此也部分地改变了传统蒙古族社区的社会结构。

## 二、草原与体制—反思草原围栏化

蒙古族的生活方式经历了前现代的古列延、阿冥勒、苏鲁克到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新苏鲁克、人民公社、牧业大包干、草畜双承包到2002年以来的“双权一制”。这一过程中的最大变化是草场资源(水和草场)从群体公用到个体私用的变革。生产方式的变革直接影响了蒙古族的社会组织结构、改变了蒙古族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直接的互动和沟通方式。在此过程中, 既有农耕对畜牧业的冲击、基于“农耕优于畜牧”思想导致的政策偏差, 也有国家现代化的推动。对蒙古族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变迁分析可以1949年前后为界, 也可以循着牧场资源(水、草)从公用演变为私用的过程展开。

### (一) 草场使用权制度的变迁

从内蒙古自治区成立之初直到1983年, 锡林郭勒草原的畜牧业生产中牲畜归属问题会随时、随势发生改变, 但草场始终是公用的。1984年内蒙古开始实行草场承包责任制, 明确所有权归集体, 使用权归牧户, 草场使用权逐步划分到浩特或牧业组。从1989年起, 全盟深化草畜双承包责任制, 推行有偿使用草牧场的制度, 确定牧户或浩特的草场面积、收费标准, 明确牧户和浩特在草牧场使用管理方面的责、权、利。1995年, 盟委和行署根据《进一步完善草场牧场承包责任制》和《关于推行草畜平衡责任制的暂行管理办法》采取措施, 加大草牧场划分承包到户的力度, 确定牧户草场的界限和亩数。1996年内蒙古草场流转制度出台。草场承包到户, 牲畜头数逐年增加, 草畜矛盾突

出, 在草牧场公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的前提下, 内蒙古开始实施草场有偿转让制度。到1997年, 草牧场全部划分到户有偿使用。各牧户根据自治区《畜牧业承包合同管理条例》, 履行承包合同手续, 发放了“二证一书”, 即草场所有证、使用证和合同书。

### (二) 分析与反思

1. 蒙古族的畜牧业解放前经历了多次部落及政权更迭, 但牧区产权制度始终没有重大改变, 即草场归部落领主或牧主, 一般百姓有使用权。《游牧文化的终结》一书中记载: 各旗王爷及其下属能灵活决定草场使用权, 因为他们既管百姓又管地块。各旗领地通常包括供春、夏、秋、冬四季草场。这些季节草场又分给不同的苏木和嘎查。因此, 每个在地牧户都有使用权。这意味着各牧户虽然没有草场, 但只要有人力就可使用草场。<sup>[6]</sup>

当时的畜牧业不像现在的独户经营, 也没有家庭牧场, 蒙古牧民一些家庭之间通常组织起来成为小组, 组内不同家庭之间共享劳动力, 以减少干旱、洪水或者暴风雪等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这些小组是构成经济、宗教社区最基本的居民点。在此基础上, 毗邻的小组能通过非正式的协商机构共同使用它们共享的一些资源。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体制对外来人口仍有排他性, 这种草场“公地”的边界清晰, 因而与哈丁“公地悲剧”中假设的牧场向所有人开放和无偿使用有着本质的区别。

2. 1949年之前, 由于连年战事, 草原上的牲畜数目下滑严重。解放后全国其他地方都经过土地改革后, 土地归公, 使用权分户。内蒙古自治区在这一点上体现了自治权利。在渐进的土地所有制变革中, 乌兰夫和当时的自治区政府制定了“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主牧工两利”政策。政府鼓励牧民自发成立互助组。组内成员分工合作, 安排放牧。1956年以后大规模建成的人民公社、高级社只是表面形式, 如白银锡勒牧场以及锡林郭勒盟的其他地区曾经发生过每个公社里的所有牧民可以到公社食堂免费吃饭等现象。实际上, 这一阶段的畜牧业生产活动还是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开展的, 其他产业支持畜牧业的大格局未变。此时的牧业“大锅饭”就有了两层含义: 一种是有形的, 如上文提到的“社员到社里免费吃饭”; 还有一种隐性的大锅饭, 就是当时牧区比农区富裕且人口少, 人均占地多, 使周边一些汉族和蒙古族为躲避

政治运动进入草原。这些不熟悉草原生态环境和放牧技术的新人占用当地牧民的草场放牧,造成了部分草场生态退化。这在大包干和“文革”时期,还有在国营农牧场上常见。

3. 草畜双承包制度的推出与改革开放后农区推广“包产到户”的时间段相吻合。简单讲,“草畜双承包”就是要让牧民在争取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的过程中,不得不关注生态效益。这种将蒙古传统公用草场即传统游牧经济的根本划分到个人的政策带来了牧民生产生活所有领域的变革,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的支持,包括:牧民定居、草原围栏、舍饲圈养、人工饲养草料、水利资源的利用等等。“草畜双承包”实行至今已二十多年,国内外学者对其成效作了大量研究。一些学者认为草原“草畜双承包”制度打破了“草原无主、放牧无界、草原无价、使用无偿”的旧观念,树立了“草原有价、使用有偿、建设有责”的新观念。<sup>[7]</sup>有学者认为以保护生态为目的的“草畜双承包”因为阻挡了动物的迁徙,使动物只能在围栏草原范围内啃食草场,造成草场沙化,草原物种单一(大牲畜,尤其是土种大牲畜因为食草量大,连续在围栏内啃食践踏造成围栏内草场退化),不利于天然草原的生物多样性演变,不利于天然草原稳定的演替状态。<sup>[8]</sup>也有些基于成本效益的分析,认为围栏草原造成草场退化还造成牧民的支出增加和牧民贫困化。2001年起,政府进一步推行禁牧休牧政策以恢复退化草场,并配套出台了生态移民和舍饲圈养等配套政策,这其中政府投入的资金巨大。<sup>[9]</sup>

### 三、畜种改良的现代性隐喻——“科学”与技术之于内蒙古草原生态建设

“畜种改良”在不同语境下也有不同含义,本文中所指的“畜种改良”主要是指引进外来品种与本地品种杂交的改良方式。内蒙古草原的现代畜种改良集中在锡林郭勒盟,而锡盟的畜改工作发轫于昔日的锡盟种畜场,所以对白银锡勒牧场畜改工作的研究有以小见大的作用。本文根据《锡林郭勒盟畜牧志》和《白银锡勒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把包括白银锡勒在内的内蒙古60年畜种改良分为为大集体推广时期、分户经营推广(包产到户)时期和近十年来的生态保护时期。

畜种改良的大集体时期(1956—1982年)可以概括为政府推动型,有着强烈的政治色彩。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下发了《关于1959年家畜改良辅

导站设置办法方案》,畜改由当地党政统一领导,经费由自治区划拨预算。这就为畜种改良能够推广下去提供了最后的保障——经济资助。据《锡林郭勒盟畜牧志》记载1960年:“根据内蒙古党委召开的农业书记会议确定牧区40%的母羊要在七月份全面开展夏季配种接羔,无论农区或者牧区配冬羔工作都必须用细毛羊种公羊配种改良。”<sup>[9]</sup>

但这种做法的水土不服也逐渐显现。首先是畜牧业成本大幅上升。尽管改良羊的个体产值高(某些单项指标如产毛、奶或肉),但其需要配套的饲养条件,如水资源、草料等,这些都是内蒙古草原最珍贵稀缺的。舍饲圈养这些牲畜会导致定居并引发草场退化等严重后果,而内蒙古各地土产戈壁羊和乌珠穆沁羊则完全可以在自然条件下实现繁衍。

包产到户阶段(1984—2000年)的畜改工作则显示出了明显的市场导向性,这与20世纪80年代草场承包到户后,牧民的放牧空间受到限制、且有一定的自主选择权有关。畜种改良从此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畜种改良无法持续的原因有二:一是制度变化,即包产到户、发展市场经济等原因导致各级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大集体时代建成的配种网点也多呈瘫痪状态;二是此时在畜种改良博弈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市场而非行政命令。另外,生态环境对畜种改良的限制作用日益突出。白银锡勒牧场是针茅草原,却被设计成细毛羊研发基地。针茅很容易附着在细毛羊的长毛上并旋转扎入体内,结果不但影响羊皮质量,还会导致羊的死亡。草畜承包以后,牧场职工有了生产自决权,不到三年就将细毛羊全部淘汰,改回土种羊。<sup>[10]</sup>

生态保护阶段(2001—2008):内蒙古自治区2000年开始实施围封禁牧。牧民在此背景下为使生活不受影响,就开始对牲畜“压缩数量、提高质量”。这等于开始新一轮的畜种改良,其逻辑是:好畜种能提高生产率,即在不增加牲畜头数、不增加草场压力的前提下,牧民的收入也能提高。

这一轮畜种改良有两点不同于前两次:第一,它在保护生态的口号下进行。在当今舆论大讲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保护生态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从而具有更大的公益正当性。第二,内蒙古的生态系统无法为改良畜提供充足饲料,只能购买或种植饲草料来保障供给。由于内蒙古草“地广人稀,土地资源丰富”,所以在当地种种植饲料更为可行,因而也更通用,因此草原生态的风险性其实更高,因为导致了新一轮的草原开垦。

#### 四、结语与讨论

白银锡勒牧场是内蒙古畜牧业的缩影,也是锡林郭勒盟和整个内蒙古草原科技的缩影。长期以来,内蒙古草原管理政策基于以下两个研究角度制定:

首先,草原评价方法基于美国植物生态学家克莱门茨创立的静态、平衡草原模型。该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具有内部调控能力,因而其动态具有方向性和可预测性。中国科学界的草畜平衡、以草定畜之说,地方政府的载畜量制定都以此为据。从此,科学知识和术语逐步取代了蒙古族传统生态知识。近年锡林郭勒盟实行的“围封转移”政策也是基于这种科学假设:即围封草场、移出牧民就能恢复草场植被。近15年国外的生态学研究证明:内蒙古干旱半干旱温带草原属于非平衡(non-equilibrium)和动态类型,充满不确定性和无法预测性。<sup>[11]</sup>也就是说,先前作为决策依据的科学理论前提仍需验证。

其次,有学者认同哈丁的“公地悲剧”假设:由于公共资源稀缺,所以每个人都会像困境中的囚徒一样想把自身利益最大化,所以只有牧民自己拥有草场使用权时,才会爱护它。一些地方政府也因此倡导围栏化并希望以此达到保护草原生态环境的目标。

我们通过对上述两个理论的分析,发现当政府要依据理论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时,就会努力缩小甚至消除事物之间的异质性而放大同质性,再使简化后的假设成为制定政策的基础,最终陷入试图用一种政策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药“陷阱”,其结果是解决问题的政策本身变成了问题的根源。

解决草原困境的最大挑战首先是接受而不是拒绝复杂性,科学研究领域如此,政府管理亦然。既然草原生态充满变数,那我们对草原的理解就应该是多层面的。因此,草原的发展和生态困境就不是某个学科所能解决的,而应综合采用人文、生态、社会等多层次的制度体系。简单、线性的认识论无法解决具有公地性质的草原管理制度难题。

#### 参考文献:

- [1] 麻国庆. “公有”的水与“私有”的水[J]. 开放时代, 2005, (1).
- [2] Schwartz, Henry. G., Chinese Migration to North - West China and Inner Mongolia, 1949 - 1959.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6, pp. 61 - 74. London.
- [3] 潘鸣啸. 上山下乡运动再评价[J]. 社会学研究, 2005, (5).
- [4] [http://chinaneast.xinhuanet.com/2006-11/27/content\\_8622393.htm](http://chinaneast.xinhuanet.com/2006-11/27/content_8622393.htm).
- [5] Dickson, Debbie & Webber, Michael, Environmental Resettlement and Development, on the Steppes of Inner Mongolia, PRC.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43, No. 3.
- [6] Sneath, David. Changing Inner Mongolia: Pastoral Mongolian Society and the Chinese Sta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9.
- [7] 徐志信, 陈玉琦. 草原管理与畜牧业持续发展[J]. 内蒙古草业, 1997.
- [8] 敖仁其. 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
- [9] 齐伯益. 锡林郭勒盟畜牧志[M].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
- [10] 李文军, 张倩. 解读草原困境—对于干旱半干旱草原利用和管理若干问题的认识[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 [11] 国际草原大会编写组. 草原牧区管理—核心概念注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 Humans, Grassland and Domestic Animals in Baiyinxile Pasture

SAI Han<sup>1</sup>, ZHANG Hai - yang<sup>2</sup>

(1.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2. 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t sandstorms and the desertification of grassland in Inner Mongolia have aroused much concern in China. The governments at all levels have spent much money on its improvement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n ecological turn in the study of pastoral culture in China. The Chinese scholars have realized that grassland is a whole ecological system and humans (concept and system), grassland and domestic animals are three inseparable factors. Any change in one factor will affect the whole system. Thu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rassland ecology should take the whole system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resent deterioration of the grassland ecology in Inner Mongolia is only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imbalance of the three factors.

**Key words:** population flow; grassland management; livestock improvement;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王东昕)